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杰克·齐普斯[著],莫愁[译].民间故事与童话在语义上的力量转换:灰姑娘及其影响[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2):40-49.

# 民间故事与童话在语义上的力量转换: 灰姑娘及其影响<sup>①</sup>

杰克·齐普斯<sup>1</sup>[著] 莫愁<sup>2</sup>[译]

(1.明尼苏达大学 文理学院,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 MN55455;2.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北京 100005)

**摘要:**历史上灰姑娘故事圈语义力量的转换,表明了一种乌托邦需求,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希望改变生活轨迹的诉求。通过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转换,我们能够看到童话作为神话和反神话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神话和反神话在涉及教育与文化的社会改革方案中产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毕竟讲述或写作童话是由说或做来完成的,因此,讲童话、写童话也是一种掌握知识、权力,掌控自身命运的途径。

**关键词:**灰姑娘;口头文学;书面文学

**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2)02-0040-10

对于民间故事及其相关领域的民俗学家来说,研究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他们普遍认为需要捍卫口头类型的纯洁性和可塑性,来抵御文学改编的“蔓延病”及创作扭曲但具有吸引力的故事去赚钱。相比之下,文学评论家在研究书面童话的过程中忽略了口述来源和口头性的重要性。尽管也有一些例外,但他们最多只是提及口头和流行的版本,并倾向在已完成的作品中加入统一的文学形式。近年来,多位文学评论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尝试去矫正这种情况,例如杰克·顾迪<sup>[1]</sup>、沃尔特·翁<sup>[2]</sup>、海德-戈特纳·阿本罗斯<sup>[3]</sup>、迪特尔·里希特<sup>[4]</sup>、奥古斯特·尼契克<sup>[5]</sup>、罗伯特·雷蒙德<sup>[6]</sup>、鲁道夫·申达<sup>②</sup>、沃尔夫冈·布鲁克纳、彼得·布里克列和迪特尔·布鲁尔

等。他们试图探索口头故事和书面故事两者发展中的相互影响,并确立某些故事和作者被奉为经典的原因。鉴于这些学者已做出的工作,我想强调一些颇具贡献的成果,他们对文学理论做出的努力主要集中于口头民间故事和书面童话之间张力的矛盾性。

在讨论口头民间故事与书面童话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沃尔特·翁发表了一些有趣的讨论,这可能使得我们将关注点落在书面童话形成的潜在文化动力上。沃尔特·翁在他的著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强调:

写作在一开始并没有减少口头性,反而是增强了口头的表达能力,使得口头的“原则”或成分能够组织成一种科学的“艺术”。这是一个有

**收稿日期:**2021-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研究”(16ZDA162);文化和旅游部委托项目“非遗蕴含的中国文化基因研究阐释及其应用途径——基于民间文学、民俗类非遗项目的研究”(2021004)

**作者简介:**杰克·齐普斯(Jack David Zipes)(1937—),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语与比较文学终身名誉教授。

**译者简介:**莫愁(1991—),女,河南安阳人,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和旅游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文化研究。

① 本文选自杰克·齐普斯《格林兄弟:从魔幻森林到现代世界》,译文由美国威莱大学张举文校对。

② Rudolf Schenda,“Orale und literarische Kommunikationsformen im Bereich von Analphabeten und Gebildeten im 17. Jahrhundert” in *Literatur und Volk im 17. Jahrhundert: Probleme populärer Kultur in Deutschland*, eds., Wolfgang Brückner, Peter Blickle, and Dieter Breuer (Wiesbaden: Harrasowitz, 1985), and *Folklore e letteratura popolare: Italia-Germania-Francia* (Rome: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1986).

序的解释体系,它彰显了口头是如何实现和何以达到各种具体效果的。<sup>①</sup>

沃尔特·翁之后补充道,这种“增强”有其矛盾的一面,因为写作“是一种特别先发制人的活动,即使没有词源的帮助,也倾向于把其他东西同化到自己身上”<sup>②</sup>。换言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书面写作都对口头交流强加了特定的语法规则、新的意义、心理和社会要求,并且常常忽视了口语文化中的习惯用法和语义。事实上,西方的社会化使得书面文学成为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媒介。口头故事给成套的经典文学故事提供了声音资源,但只有熟知经典故事集里规则和主题的重述者,才会对这些规则和主题提出质疑或挑战。

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我在《打破魔咒:关于民间故事与童话的激进理论》一书中将欧洲童话文学的兴起描述为口头民间故事的“资产阶级化”。所谓资产阶级化,是指受过教育的人将本属于农民,经由其传播的故事占为己有,这些农民大部分不识字,没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主要是资产阶级)改编了故事的风格、母题、主题和含义,以满足新的不断扩大的读者的兴趣和需要——特别是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也就是说,它在口头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勃兴,同时也丰富了口头民间故事。在许多情况下,例如格林兄弟在记录民间故事时所做的,即使他们将原来的口头故事改变了许多,却也增强了故事的口头性。因为这种修改有助于定义和解释故事的修辞与内容,并使故事里残存的可能会消失的民间元素予以保留。记忆是具有选择性和历史性的,口头故事在衰落前只能保留世代相传故事的基本元素。因

此,书面文学可以补充和完善口头传统。但是书面语言本身所蕴含的文体和语义上的力量变化表明,一种不同的社会意识正在规划和调控文化产物,并在它们身上烙下印记。

简而言之,人们认为随着书面童话的出现,那些欧洲“民间”或文盲群体的口头故事被剥夺了。因为童话文学逐渐成为文明社会的典范类型,用于记录早期文盲群体感知和接收的各种内容。我并不认为书面类型已经消除或取代了口头传统,也不赞同书面文学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完全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毫无疑问,随着 19 世纪和 20 世纪文化及教育的发展,书面类型已成为惯例或机制并决定着西方接受古典童话的核心因素。这种发展趋势对儿童和成人的社会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一个特定的故事标准在不断地被重复和利用,这些经典故事大多强调男性的冒险、权力和女性的家庭生活与顺从。

在过去的 20 年里,各种批评家分析和审视了古典童话中的性别歧视和中产阶级偏见。<sup>③</sup>但是,正如我在《小红帽的考验与苦难》一书中试图展现的那样,把“经典的”童话文学及它的影响看得过于片面,是很危险的。当然,书面文学借用一个乡村女孩在森林里遇见狼人的口头故事,将其转化成一个贫困社区里的精明女孩应该对“资产阶级”女孩被强奸自我负责的文本。<sup>④</sup>然而,这个故事也是一个警告,让孩子们意识到潜伏在陌生地方的危险。此外,它是一个关于性欲望被压抑从而滥用暴力的故事。<sup>⑤</sup>

在研究书面文学对口头民间故事的借用时,必须考虑不同受众对口头民间故事的接受方式和方

①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2.

②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12.

③ Andrea Dworkin, *Woman Hating* (New York: Dutton, 1974); Maria Kolbenschlag, *Kiss Sleeping Beauty Good-bye* (New York: Doubleday, 1979); Jennifer Waelti-Walters, *Fairy Tales and the Female Imagination* (Montreal: Eden Press, 1982); the essays by Marcia Lieberman, Karen Rowe, Susan Gubar and Sandra Gilbert in *Don't Bet on the Prince*, ed. Jack Zipes (New York: Methuen, 1986); Ruth Bottigheimer, *Grimms' Bad Girls and Bold Boys: The Moral and Social Vision of the Tal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Marina Warner, *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 On Fairy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5).

④ 根据齐普斯的观点,小红帽故事的隐喻契合了 18 世纪流行于法国、德国的文学主题,从道德层面看,佩罗将狼的含义引申为欺骗资产阶级女性的男性诱奸者。美丽单纯的少女与陌生人说话导致了诱惑,闲荡、缺乏自律等将她带入狼窝。小红帽的罪行在于她同魔鬼讲话和自身的引诱而被强奸,因此受到了惩罚。(译者注)

⑤ 根据齐普斯的观点,在西方社会中女性一直是男性的猎物,狼象征着本性的冲动和社会的失调,狼吃掉小红帽,代表一种明显的性行为,显示出无法控制的欲望和人性的紊乱。基于男性需求的被剥夺,小红帽反映了男性对自身及女性性欲望的恐惧和性冲动的抑制与调节。(译者注)

法,以及童话文学在口头互动、社会情境和媒介中被重复利用,从而影响根深蒂固的书面类型“对话性”的发展。让我们以“灰姑娘故事圈”为例,讨论口头故事与书面文学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奥古斯特·尼契克<sup>①</sup>的《童话故事镜子里的社会秩序》以及海德-戈特纳·阿本罗斯的《女神与她的英雄们》中,灰姑娘的口头故事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已故的“带礼物的母亲”为女儿提供了三件礼物,使她能够在阴间、大海和天空完成任务,这样她就可以“解放”一个野蛮的男人。作为英雄的男人,是一个次要的外因,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局外人,当他融入另一个受母系女神仪式统治的部落,被年轻女子人性化或文明化后,表现出了自己的诚实、正直。正如各位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发现的,他们的许多研究都收录于阿兰·邓迪斯实用的《灰姑娘故事汇编》<sup>[7]</sup>一书中。在埃及、中国、斯堪的纳维亚、非洲以及欧洲和美洲,灰姑娘故事版本数以千计,但原型故事并不是很清楚,如果有原始版本的话,则来自于母系社会。我认为尼契克和海德-戈特纳·阿本罗斯都从古代遗迹、月亮崇拜以及母系宗教仪式中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说法,即灰姑娘故事圈的一股是从母系口头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例如,这里有来自非洲<sup>②</sup>的有力证明,阿富汗和伊朗故事中的“510A型灰姑娘故事”可能起源于女性仪式。玛格丽特·米勒基于一个穆斯林妇女仪式的语境去研究灰姑娘异文,在穆斯林妇女纪念穆罕默德的女儿和阿里的妻子的美食与仪式餐中,伊朗故事玛彼莎尼(月亮额头)<sup>③</sup>起到了加强穆斯林女性团结的作用。下面是玛格丽特·米勒

对灰姑娘故事的描述,其源自一个女孩在仪式餐中听年老寡妇讲述玛彼莎尼故事的田野笔记。<sup>④</sup>

一个商人送他的女儿去一所宗教学校读书。有位女教师是一个寡妇,她询问女孩的家庭经济状况,女孩回答说很好。老师又问女孩她家里有什么,女孩说家中有醋。老师便说服女孩,老师是好人,而她的母亲却非常坏,然后老师让女孩告诉母亲她想要一些醋。当母亲去取醋的时候,女教师把她推进去并盖住了储物罐。老师让女孩不要告诉她的父亲,只说是母亲自己掉了进去。

当父亲发现女孩母亲时,她已经死了。(在这里线人提到了舀灰,以及女孩回答“是”。<sup>⑤</sup>)后来,父亲在牛棚里发现了一头黄牛,“是在母亲被谋杀的地方”。父亲和老师结婚了,他有了新的妻子和一头黄牛,父亲让女儿去牧场放这头牛。新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后,开始虐待女孩。白天女孩去放牛的时候,继母只给她烂面包吃,还拿一些生棉花让女孩在牛吃食时清洗和纺织,却不给她用来加工和操作的工具。因为无法纺织棉花,女孩在田野里哭了起来,她只能把棉花纤维钩在荆棘上,然后离荆棘远一点用手指转动它们。

黄牛突然说话了,问女孩为什么哭。女孩抱怨继母让她做这个任务,“如果我不做的话,我的继母就不让我回家。”黄牛提出要看她的面包(线人补充道,听故事的女孩每隔一会儿就继续说“是”),女孩便把面包给了黄牛。接着黄牛把棉花吃了,晚上它排泄出来的便是棉纱线。

① 尼契克也在他的文章进行了讨论。参见“Aschenputtel aus der Sicht der historischen Verhaltensforschung” in *Und wenn sie nicht gestorben sind...Perspektiven auf das Märchen*, ed. Helmut Bracker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P71~88.

② William Bascom, “Cinderella in Africa” in *Cinderella: A Casebook*, ed. Dundes.

③ Margaret A. Mills, “A Cinderella Variant in the Context of a Muslim Women’s Ritual” in *Cinderella: A Casebook*, ed. Dundes.

④ 根据原文信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勒的论述基于同行拉菲克·科夏瓦杰 1978 年在伊朗调查的田野笔记。由于拉菲克·科夏瓦杰为男性,不能参与这个妇女仪式,他便寻找了一位老妇人作为主要线人。该笔记中的故事文本即是老妇人对仪式过程(而非实际仪式展演事件)的规范描述。米勒认为仪式餐中,失去母亲的小女孩听寡妇讲述“玛彼莎尼”,进一步强调了故事中占主导的主题(女性被离弃和团结)。如故事开头小女孩对母亲的“背叛”是团结与救赎等式中的重要因素,女性应该团结在一起呼吁母性精神。(译者注)

⑤ 根据原文信息,“灰”是一种仪式餐中完全由妇女制作、献祭的食物,原料为面粉和豆、肉、蔬菜等。“灰”必须在清真寺中食用,成年男性没有吃的权利。当寡妇和孤女坐在一起时,寡妇面前是满碗的“灰”,而小女孩面前是空碗。寡妇边把“灰”舀向女孩的碗,边讲玛彼莎尼的故事。每次女孩的碗里多一勺“灰”,她就必须回答一声“是”。故事讲完后,女性分发和食用“灰”,这样仪式才算完成。(译者注)

女孩把所有的棉纱线都收起来，带回去交给了继母。

连续三天，继母照例让女孩吃坏的面包，给她更多的棉花去纺织（听故事的女孩回答“是”）。第三天，当女孩给黄牛棉花时风吹走了一块，棉花掉到了一口井里。女孩正准备下到井里，突然黄牛告诉她：“你走进井里后会看到一个老妇人巴桑吉，当你看到她时要说‘色兰<sup>①</sup>’，并问她索要棉花。老妇人会说‘帮我抓下头发里的虱子’，你应该说‘你的头发非常好，比我的还要干净’。”

女孩按照黄牛说的去做。老妇人叫她帮忙整理头发，女孩便这样做了，然后老太太问：“我的头发上有什么啊？”女孩回答说：“什么都没有，你的头发比我妈妈的还干净，就像一朵玫瑰花，我妈妈的头发上满是灰尘。”老妇人让她去某个房间取棉花。女孩走进房间，看到里面装满了珠宝，但她只拿了棉花并把房间打扫干净。女孩离开时与巴桑吉告别，爬上梯子准备从井里出去。当女孩爬到一半时，巴桑吉用力晃动梯子，想看她是否偷了东西藏在衣服里。然而并没有珠宝从女孩的衣服中掉落，于是老妇人祈祷她的额头中央会出现一个月亮。当女孩爬到梯子顶端，巴桑吉又摇了摇梯子，再次祝福她：“愿你的下巴上有一颗星星！”

女孩回到了黄牛身边，黄牛让她遮住额头和下巴，这样的话，她的继母就不会看到上面的月亮和星星。接着女孩带着黄牛回家了。那天晚上，当女孩睡觉时她的面纱滑落，继母发现了月亮和星星。第二天，继母让自己的女儿去放牛，拿给她一些生棉花和香甜的坚果面包。继母的女儿同样无法纺织，她猜测是黄牛帮助了姐姐，于是她拿出甜面包给黄牛吃，然后把棉花也给了黄牛。但是黄牛只产出了非常少的纱线。

第三天，继母女儿的棉花也被风吹进了井里，她循着棉花看到了那个老妇人，她向老妇人索要棉花却没有说“色兰”。然后老妇人叫继母女儿帮忙整理头发并问她自己的头发怎么样，她回答说：“你的头发太脏了，不像我妈妈的头发非常干净。”老妇人让继母女儿去打一个房间并取走棉花。她从房间里拿了一些珠宝，在

老妇人摇梯子时珠宝从继母女儿的衣服中掉了出来。老妇人说，诅咒你的额头上出现一头驴的阴茎！当继母女儿爬到梯子的顶端，老妇人又摇了摇梯子，更多的珠宝掉了下来。于是老妇人又加了一个诅咒，“你的下巴上还会有一条蛇！”

继母女儿回到了黄牛身边，黄牛看到了她脸上的阴茎和蛇，却什么也没说。继母女儿把黄牛带回家，她的母亲用刀割下了阴茎和蛇，然后用盐遮住了伤口，但这两个东西一夜之间又都重现了。继母猜到是这头黄牛在背后作祟，就假装生病并贿赂医生去告诉她的丈夫，她必须吃这头黄牛肉，把牛皮扔到她身上，才能恢复健康。与此同时，女孩也意识到黄牛是她亲生母亲变的，于是她喂黄牛吃甜的鹰嘴豆和面包。有一天，黄牛哭着告诉她：“他们今天要杀我，如果我死了，你的生活将会变得非常艰难。当他们杀我时你千万不要吃肉，把我所有的骨头都收集在一个袋子里，埋起来然后隐藏好。”女孩哭着恳求父亲不要杀黄牛，她告诉父亲，对自己来说黄牛是她最重要的财富。父亲说这头黄牛必须被杀死，因为这是治好她继母唯一的药。

女孩按照黄牛的指示，在黄牛被杀后将它的骨头收起来。随即继母“康复”了。几天后女孩全家被邀请去另一个城市参加婚礼，继母和她的女儿决定前往。因此继母割下了自己女儿脸上的阴茎和蛇，将盐涂在伤口上。之后，继母把小米和“坩谷”（另一种小种子）混合在一起，安排女孩在花园的空水池前将种子区分开，并且要用她的眼泪把池子填满。然后继母和她的女儿一起去参加婚礼了。当女孩看到一只母鸡带着许多小鸡走进花园时，她坐在那里哭了。母鸡忽然说话了，告诉女孩先把盐和水放到池子里，而后到马厩去，在那里她能找到好的衣服。母鸡让女孩穿上漂亮的衣服，骑着马去参加婚礼，而小鸡会帮她把种子分开。母鸡补充道，当你回来时一只鞋子会掉进水里。不要停下来捡，快点离开，这样你的继母就不会认出你了。

果然，女孩在马厩里找到了一匹神奇的马、

① 此处为阿拉伯文 Salam 的音译，亦译“色俩目”，意为“和平”“平安”，穆斯林相互间的祝安和问候语，礼拜时也向左右互道“色兰”。引自《辞海（宗教分册）》，夏征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一套漂亮的衣服和一双金色的鞋。她骑着马去参加婚礼,并遮住了自己的额头和下巴。当舞会开始时,他们把女孩带到单身女士派对的客人面前。当她跳舞的时候,女孩的妹妹认出了她并告诉自己的母亲:“这是我们的玛彼莎尼。”继母说:“不可能的!”她们离开婚礼去查看女孩是否在家,那个客人究竟是不是她。玛彼莎尼骑着马向前冲,想赶在继母和妹妹前面回到家,但是她不慎将一只鞋子掉进了水里。当女孩回到家时,她意识到母鸡已经变成了马。女孩穿回她的旧衣服,坐下来把剩下的几粒种子分开,这时水池里已经满是“眼泪”。随后赶回来的继母对自己女儿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不是她了!”

两天之后,一位王子在水边骑马,但他的马却怎么都不肯饮河里的水。王子低头一看,发现了女孩的鞋子并把它拿给父亲,说他想娶这只鞋的主人。国王派他手下的官员让每个人都试穿这只鞋子,所有人都希望它能合自己的脚,但事实并非如愿。最后他们来到了玛彼莎尼父亲的家,继母洗干净女儿的额头并剪掉上面的阴茎和蛇,然而鞋子并不合她的脚。于是官员准备离开了。女孩被锁在面包炉里,一只公鸡在炉顶上飞来飞去地啼叫:

一个月亮在烤炉里! Mahidartannur

一个人在里面, ku-ku! Sararunjah, qu, qu!

合适的脚在哪里,像水晶? Pakucibolur

一个人在里面, ku-ku! Sararunjah, qu, qu!

继母和她的女儿试图抓住那只公鸡,但公鸡躲过了她们并且又叫了两声。官员生气了,执意要看看烤炉,他在里面发现了玛彼莎尼。鞋子非常合女孩脚,因而她顺利地嫁给了王子。

故事母题体现出对母系社会月亮崇拜的强烈认同。玛彼莎尼成功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还获得了月亮和星星的标记。此外,已过世的母亲带着礼物来指点她,并在决定她命运的时候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米勒所言,在这个故事里,男人是偶然的因素。

“玛彼莎尼”故事忽略了男性人物如此的形

象:父亲和王子几乎完全成为女性斗争的被动战利品,就像是男性的新娘。在男性被排斥在外的表演语境中,对邪恶女性的羞辱是通过使用雄性标记达到的<sup>①</sup>。灰姑娘故事是典型的女性叙事,这揭示了女性认为变得引人注目的标记既是男性化也是灾难性的。

但是现代世界里,灰姑娘故事主流版本中的“标记”仍然是男性化的,并且由于父权制化而混淆模糊了以往的母系传统——特别是在书面文学传统中,而这情况又不单存在于书面传统。

通常来说,随着母系社会被征服或改变,母系故事的父权制化进程通常从口头传统开始。这种父权制化导致以强调男性优越感与太阳崇拜的英雄和仪式取代了女性主角和月亮女神庆祝仪式。根据戈特纳-阿本罗斯的观点,父权制化的主要特征在于女神的妖魔化(即赋予善良公主以恶魔的特征),女主角转变为一个英雄,强化和加固父系婚姻、女性仪式符号的消解与衰退,以及有着严重月亮崇拜情结神话的结构变形。因此,“灰姑娘式”的女主角在四千年(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到3000年间)的历程中发生了变化,她从被期望在智慧的带着神力的已故母亲的指导下追求自己命运的女性,变成了无助、无作为的青春期少女。她的主要事业是家庭,而且必须顺从地等待被一位男性救出。这种口头传统中的父权制化为书面文学传统下故事的资产阶级化奠定了基础。

欧洲三大文学(由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夏尔·佩罗和格林兄弟评出的)之一“灰姑娘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继续保留了母系传统的残余和痕迹,同时还重新阐述了如何使用口头象征母题和文学传统主题来表现社会经验(分别在16、17和18世纪)。在巴西耳的“猫姑娘”(1634~1636年)中,泽佐拉是一位王子的女儿,这个年轻小姐杀死了邪恶的继母,让看起来甜美和温柔体贴的家庭教师取代了她。然而,和蔼友善的家庭教师却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悍妇,她有六个女儿。泽佐拉被驱赶到厨房的壁炉中,别人都叫她“猫姑娘”。但是逝去的母亲化身为仙女的鸽子,泽佐拉得到了种植后能让她参加三次舞会的枣椰树。她最后一次去舞会时丢了一只鞋子,迷恋泽佐拉的国王找到了她并使其成为王后。虽然巴西

① 根据原文信息,米勒提及蛇在故事中等同于男性生殖器。继母女儿脸上的阴茎和蛇奇怪而丑陋,这是她与母亲试图欺辱其他女性和为了争夺男性而恶意竞争的结果。

耳允许泽佐拉故事保留一些母系特征，比如让她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使用了口头风格（巴西耳用规范、造作的那不勒斯方言写作故事），但故事仍具有明显的父权制化特征：对家庭女教师的妖魔化、泽佐拉结婚前的顺从以及她被国王拯救。

佩罗的灰姑娘故事出版于 1697 年，其中大量借鉴了巴西耳的版本。这一版本通过强调灰姑娘的无助及她作为家庭主妇勤劳谦虚的性格，并融合了路易十四国王宫廷的时尚风格等来加强父权制。这表明佩罗与古代母系传统没有丝毫关联，他只是创造了一位明显是仙女的教母，就像他创造了应该不会断裂的水晶鞋一样。佩罗在尝试建立资产阶级贵族文明准则的同时，实际上嘲笑了文盲群体的传统惯例和习俗。<sup>[8]</sup>此准则是在那个时期逐渐形成的，它阐述了不同社会阶层成员和两性群体所期望的正确行为方式。与佩罗相比，格林兄弟在 1812 年的灰姑娘版本中，通过重新建立与已故母亲、鸽子和树之间的联系，向母系社会传统表达了更多的敬意。但是他们也让灰姑娘这位年轻的女子变得顺从，使她能够配得上国王。他们强调克己忘我、顺从和勤劳等美德，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新教伦理倡导的重要品质。

直到 19 世纪末期，西欧和美国的两种主流灰姑娘故事依旧是佩罗和格林兄弟的版本，它们经常被混在一起，构成流行、光鲜的儿童版本。始于母系社会女性成年庆祝仪式的口头故事（没有解释性的修饰）已在资产阶级文明准则下发生了改变。该准则规定了年轻女性进入婚姻应满足的要求：自我牺牲、勤劳、安静、谦逊和有耐心。当然，这个故事也可以从另一个非性别的层面解读，它描绘了一个从富有到贫穷然后又从贫穷回到富有的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谈及书面文学对口头故事的先发制人和对清苦、禁欲生活方式的颂扬（格林兄弟版本中有更为具体、清晰的阐述）。也许文盲群体难以理解这些理念本身就是一个目标，灰姑娘故事实际上是在强调自我放弃、节俭、勤奋、机会主义和物质幸福的社会里，一条青年的既定成功之路。故事采用了异性婚姻的形式，在这种婚姻中，作为财富持有者的配偶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如国王终究是水晶鞋的发现者和拥有者。

尽管佩罗和格林兄弟的版本在整个西方已经被制度化，但它于意识层面上并没有完全以我所呈现的方式被接纳和推崇。从 19 世纪开始，许多作家创作了灰姑娘的戏仿作品，或者基于格林兄弟和佩罗

的版本进行改编。灰姑娘故事的经典模式早已在受过教育的各年龄人群的思想中确立，作家们本着认真的态度提出在意识形态层面引入经典模式的替代方案。此外，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在田野调查中记录了大量灰姑娘故事的口头版本。他们的故事虽然经过修改，却也彰显了书面文学的影响，这些口头故事通常也会反过来影响其他文学版本。最后，诸如广播、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体已经展现了灰姑娘故事的不同版本，这些变体或者加强了父权制化的文本，或者对它们提出了质疑。

如果试图追溯灰姑娘故事自 17 世纪进入书面文学领域以来所运用的方式，就得从美学、意识形态、心理等层面来处理书面挪用和口头再次挪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调查其中每一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例如，从 19 世纪开始出现的各种灰姑娘的戏仿文学和严肃改编，显然是受到佩罗和格林兄弟经典故事的影响。这些故事在家庭、学校与剧院的当面对流中被以口头形式重述、记忆和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于特定时代的书面文本可能被认为是转换的符号意群或语义整合，即在口头互动、社会规范、公认行为和主导意识形态等方面，它们都指向了写作中矛盾的一面。

所谓符号意群或语义整合，我指的是按照特定的顺序，把口头叙事排列为书面文学符号并赋予社会内容，使其代表作者或统治阶级所青睐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可以说，只要在特定的时代，这些符号意群凝固成书面文学就会变为典范，它们通常为儿童树立榜样。然而随着社会和性观念的转变，经典故事的含义也随之变化。由特定文学符号意群所认可的标准在口头交流中经常变得矛盾或被颠覆，并在制度化的话语中产生新的文学重组。因此，必须将这类童话故事圈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量，同时要兼顾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再以“灰姑娘故事”为例，我想指出在过去的 20 年里，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改编倾向于质疑经典灰姑娘（即佩罗和格林兄弟的版本）的美学和主题特征，并介绍了一些源自口头发明和文学实验的新元素。许多作家创作了灰姑娘的故事和诗歌，如安妮·塞克斯顿<sup>[9]</sup>、伊林·费切尔<sup>[10]</sup>、理查德·加德纳<sup>[11]</sup>、塔妮什·李<sup>[12]</sup>、雅诺什<sup>[13]</sup>、约翰·加德纳<sup>[14]</sup>、奥尔加·布鲁姆斯<sup>[15]</sup>、杰·威廉姆斯<sup>[16]</sup>、玛格丽特·卡萨杰普<sup>[17]</sup>、朱迪斯·维奥斯特<sup>[18]</sup>、罗尔·德达尔<sup>[19]</sup>和简·约琳<sup>[20]</sup>等。这些作品具有女权主义倾向或对经典故事讲述的歪曲质疑。例如，德达尔诙谐的诗

歌开头即体现了暗含于诸多灰姑娘版本中的典型态度:

我猜你认为自己懂这个故事。  
你并不懂。真正的故事更加血腥。  
你知道的只是虚假的幻像。  
年复一年的编造,  
只是为了让所有的声音柔和、丰富,  
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sup>①</sup>

正如德达尔一样,很多“新灰姑娘”故事的作者着手修改自己阅读和聆听童话的童年经历。他们与整个类型划分机制展开对话,其中大多数人重新编排了灰姑娘的情节(通常不采用她的名字),让读者了解女主角被动性背后的状况。大部分情况下,灰姑娘被重新描绘成一个学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年轻女性,或者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没能更积极主动的傻瓜。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些最近的“新灰姑娘”故事,以此说明语义转换如何揭示文化态度在性别角色、虐待和继母角色等方面的变化。这些故事的作者分别是安·杰曼、盖尔·卡森·乐文、菲利普·普尔曼、帕特里夏·加洛韦、弗兰西斯卡·莉亚·布洛克、爱玛·多诺霍和格雷戈里·马奎尔等。

杰曼为年轻读者创作的《灰姑娘和热气球》<sup>[21]</sup>是 90 年代出现的传统故事中最滑稽的女权主义版本之一。埃拉是一个富商的女儿,比起盛装打扮和周旋于上流社会,她更喜欢骑马和与普通百姓交好。当国王邀请她及姐妹们去城堡参加舞会时,埃拉让仆人和仙女教母替自己去,而她则留在家烤土豆、做南瓜汤。仙女教母和朋友们回来后,大家继续在埃拉组织的午夜派对上跳舞。突然,所有的邻居都涌现而出,就像比尔王子迫不及待地逃离父亲的压迫那样。<sup>②</sup>埃拉喜欢比尔王子,因此她决定帮助王子逃跑,并与他一起乘热气球飞走了。

杰曼致力于描绘一位知晓自己想法和欲望的年轻女子,而乐文、普尔曼和加洛韦都以新颖的方式将注意力从女孩转移到男孩身上。乐文为 7~12 岁的读者写了一系列童话故事,其中《灰姑娘和玻璃山》<sup>[22]</sup>介绍了一名叫做埃利斯的年轻农场工人,埃利斯与两个继兄弟拉尔夫、伯特住在一个虚构的比德尔王国。他们都是孤儿,而埃利斯被大家称为“灰姑娘”。这个名字源于他在发明一种飞行粉末时弄

巧成拙,被烟囱里的煤烟和灰烬覆盖。埃利斯总是试图赢得他那两个兄弟的注意和尊重,但乏味苦干的兄弟俩还是忽视了他,于是埃利斯像玛丽格德公主一样孤独。玛丽格德公主没有母亲,她的国王父亲则经常因任务外出。终于有一天,父亲意识到他的女儿应该出嫁了,因此他准备了一个比赛来选择骑士娶玛丽格德。国王建了一座玻璃山,谁能骑着马爬上玻璃山,谁就可以娶玛丽格德。“灰姑娘”埃利斯在三匹神奇的马和飞行粉末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挑战。

乐文的叙述很滑稽,但却有些老套。埃利斯和玛丽格德谦逊天真,他们都面临着孤独和被忽视的问题。一旦遇到彼此,他们显然不再需要兄弟或父亲,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普尔曼的《我是一只小老鼠》<sup>[23]</sup>中的罗杰是另一种情况,它比乐文琐碎的故事更具悲喜交加的色彩。在这部小说里,一个衣衫褴褛、肮脏邋遢的小男孩在晚上十点突然出现于鞋匠铺门口,一对名叫鲍勃和琼的老夫妇庇护和照顾了他。老夫妇听小男孩说他没有名字时非常困惑,他俩向他解释了拥有名字的意义。鲍勃和琼没想到他们取名为“罗杰”的男孩实际上是一只老鼠,它曾经给灰姑娘做侍从,但不知怎的,仙女教母并没有把他再变回老鼠。在人类社会,罗杰必须要学会文明意味着什么,但同时他努力向老夫妇证明自己确实是一只老鼠,这在城市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极具讽刺的是,罗杰很快就发现因为想做回自己而遭到迫害。只有曾是灰姑娘的奥蕾莉亚公主才能够帮助他,证明罗杰不是一个非人类的恶魔或来自地狱深处且浸毒的野兽,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家伙。最后,罗杰放弃了再次成为老鼠的追求,因为他可能会被让大众媒体逼得歇斯底里的人们消灭。

帕特里夏·加洛韦的灰姑娘故事《真实故事中的王子》<sup>[24]</sup>中的男性形象也常被人误解。加洛韦用足以表现自己多么令人讨厌的第一人称来叙述他的故事。很明显,从第一段来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神经质和自恋的角色,“内疚、内疚、内疚。我的心理咨询师一直告诉我,必须克制总说自责感之类的废话。母亲在我出生时就去去世了,是我害死了她。由于无法忍受我的目光,我的父亲不断挑起战争,那样他就可以去打仗。也难怪,我的目光总是提醒他

① Dahl, *Revolting Rhymes*, 1.

② 根据原文信息,灰姑娘不想参加国王的舞会,而是希望拥有自己的派对。果然,包括王子在内的所有客人都加入了她的派对。(译者注)

是我害死了他的妻子”<sup>[24] (P124)</sup>。在他自我放纵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他与导师史蒂芬有过同性恋私情，父亲不满这种关系便处死了史蒂芬。父亲为王子举办了舞会并命令他必须在舞会上选择一个妻子，否则将会替他决定。王子发誓他不会结婚，但当他同一位穿着水晶鞋的公主跳舞时，她的脚趾让王子想起曾经的情人史蒂芬。年轻的姑娘匆匆逃走了，王子只捡到了她留下的一只水晶鞋，因此便痴迷于找到她。

加洛韦挑衅性的叙述涉及迷恋和自我沉醉，我们对灰姑娘一无所知，所了解的都是那个可怜的王。这就清楚地意味着，如果这位王子是灰姑娘所期待的，那么她的余生只会都是麻烦。加洛韦引人入胜的第一人称叙事揭示了灰姑娘故事幸福结局的矛盾性。除了恋足癖，我们对王子也没更多的了解。

在爱玛·多诺霍的《亲吻女巫：童话新编之鞋故事》<sup>[25] (P2)</sup>中，有另一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然而这次我们听到的是灰姑娘的声音，一个觉醒的声音。这位不知名的年轻女子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她努力通过工作来缓解她的悲伤。“没有人强迫我做事情，没有人责备我，没有人惩罚我。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刺耳的声音在我脑海里面回旋，‘做这个吧，做那个吧。你懒惰如泥。’这声音知道每一个问题和答案，有时候它问我为什么还活着。我很想留心去听妈妈说话，但是这嘈杂的声音让我无法听到她。”<sup>[25] (P2)</sup> 幸运的是，有一天，一个陌生女人出现了，她是年轻女孩母亲的朋友。她称自己是女孩母亲的树，并且实实在在地给予女孩鼓励和安慰。陌生女人让女孩参加了三次舞会，直到女孩意识到她爱上了这个年长的女人。女孩扔掉了另一只没有失去魔法的鞋子进入树林，然后同那个陌生女人一起回家。多诺霍的故事是一个成熟的童话，它颂扬一个年轻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她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弗兰西斯卡·莉亚·布洛克的《玫瑰与野兽：重述童话之“玻璃”》<sup>[26]</sup>在改编灰姑娘故事时所强调的方面略微不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描绘了一个有点拘谨，喜欢待在家里打扫卫生和给妹妹讲故事的年轻女孩。女孩遇到一个头发红白相间，看不出年纪的陌生女人，随即便开始在她耳边低声细语。不幸的是，布洛克的故事很陈腐，一个年轻女人因为敢于走出自我，赢得王子的青睐而招致姐妹的嫉妒。当她意识到姐妹因为王子对她的关注而轻视她，她跑开并丢掉了鞋子，开始在家中贬低自己。然而，王子追求女孩是因为他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因此，相比多诺霍不寻常的女同性恋故事，布洛克的成熟故事是一个更

为传统的异性恋版本。无论哪种版本，最重要的是，两位女性作者关注的不再是虐待儿童，而是对爱的需求。她们聚焦于一个年轻女性的自我肯定，女孩一直为死去的母亲悲痛不已，女孩发现自我的必要动力是一位年长、有权势的智慧女性以仙女教母的形式介入。

这种介入并没有出现在格雷戈里·马奎尔引人入胜的小说《丑陋继姐妹的告白》<sup>[27]</sup>中，该小说是近年来出现的有关邪恶继母和虐待儿童的灰姑娘故事中最生动、刺激的小说之一。马奎尔以 17 世纪的荷兰小城市哈勒姆为背景展开叙述，他非常善于捕捉当时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小说讲述了寡妇玛格丽特·费希尔及两个女儿从英国回来后的故事，露丝是一个笨拙却温柔的哑巴，艾琳是一个平凡但富有天赋和同情心的女孩。为了保护 and 养活女儿，玛格丽特找到了一份工作。起初她是一位画家的仆人，后来成为范登·米尔家庭的负责人。艾琳在范登·米尔家给美丽却焦虑的女孩克拉拉上英语课。克拉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被人绑架并被成功救出。终于，在画家妻子去世后玛格丽特与科尼利厄斯·米尔结婚了，随后她接管了这个家庭。从这一刻起，玛格丽特铁腕地掌控家庭的内部事务。虽然克拉拉和玛格丽特的女儿相亲相爱，但玛格丽特对克拉拉却极其刻薄，同时，她还痴迷于确保新婚丈夫事业的成功和自己女儿在社会上的崛起。

其实马奎尔小说聚焦的是这位继母的不朽，她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背后力量。马奎尔不轻视继母这个角色，也不加以批判。实际上整个故事是以露丝的视角讲述的，她语气简洁却坦率地表达出对母亲的同情。似乎回到当时那种贫穷的生活条件下，这就是母亲为了使女儿能够生存下来必须采取的方式和做出的努力，玛格丽特的动机与“好”社会中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露丝的“忏悔”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要展现了她的母亲为确保亲生女儿生活得更好而雄心勃勃的努力。玛格丽特因为绝望而行动，她想方设法地克服贫穷，就像那些荷兰商人在哈勒姆镇无情地打交道一样。马奎尔描绘的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所以这毫不奇怪——粗鲁而专横的玛格丽特最终没有受到惩罚，她继续生活并代表着继母身上不屈不挠的意志及一心保护女儿的母亲。

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和英国出版了大量改编自灰姑娘的文学作品，这表明此种故事类型的重要文化倾向。除了叙述的虚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

要研究。比如安德里亚·德沃金的《女人恨》，玛利亚·科尔本施拉格的《吻别睡美人》，玛西亚·利伯曼的《“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童话中的女性文化适应》<sup>[28]</sup>，简·约琳的《美国灰姑娘》<sup>[29]</sup>，科莱特·道林的《灰姑娘情结》<sup>[30]</sup>，珍妮弗·韦尔特-沃尔特斯的《童话与女性想象》<sup>[31]</sup>和玛丽娜·沃纳的《从野兽到金发女郎：论童话故事与讲述者》<sup>[32]</sup>。这些作品中的当代女性在某些方面相当于灰姑娘，因为她们已经认同了灰姑娘故事的要旨而被指责太过被动、麻木和自暴自弃。有的批评家指责这个故事在性别歧视方面有助于女性的社会化。因此，如果女性要成为自己，就必须忘掉仙女教母和王子的存在。

这种对灰姑娘角色的拒绝趋势对社会行为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影响，这可能确实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社会改革、口头文学及书面文学等重塑了妇女的角色，尤其是她们在现实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例如，几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有一个有趣的研究，J.戈德温，C. G.考索恩和 R.T.拉达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灰姑娘综合症”<sup>[33]</sup>的报道。三个九到十岁的女孩，生活在三个不同的收养家庭中，每个人都明显地受到养父母尤其是养母的忽视和虐待。当局发现并将她们带走时，女孩们都穿着破烂的衣服且衣衫不整。每个女孩都声称养父母给过自己衣服。当局调查发现，这些女孩全都“撒谎”，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实际上女孩们都身处被养母欺负、虐待的危险，养母本身也有与养女相似的经历，每个人都曾遭受过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有趣的是，女孩们通过假扮成灰姑娘暗中反抗，从而摒弃了灰姑娘顺从、被动的角色。此外，她们直观地体现了童话故事的心理核心，即幸福的结局往往趋向于压抑和虐待。正如我们在爱丽丝·米勒对童话的探讨中看到的，童话故事框架及其幸福的结尾总是自相矛盾地掩盖它试图揭露的现实和丑陋的真相。如果我们潜意识里知道灰姑娘故事的快乐结局是基于错觉，那么我们不断重提这个故事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女孩和男孩的虐待还在继续，兄弟姐妹间的竞争依然激烈，父母不倾听孩子的需要。事实上当孩子被虐待时，父母往往是压迫者。在日常生活和文学想象中重新塑造灰姑娘，仍然是文明进程

中关键对话的一部分。<sup>①</sup>

这种对话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灰姑娘故事圈语义力量的转换，从庆祝女性成年到反映社会父权制化和男女形象变化的口头故事，以及代表女性的固有顺从和男性所设定的婚姻要求的书面故事，再到有意识地描绘霍雷肖·艾尔杰白手起家神话的故事，直至刻画旨在突破传统角色的灰姑娘文学作品，这些转变表明了一种持续的乌托邦需求，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希望改变既定生活轨迹的诉求。此外，该变化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写作过程或工作中的人类力量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颠覆和民主化。通过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转换，我们能够看到童话作为神话和反神话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这种神话和反神话在涉及教育与文化的社会改革方案中产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毕竟讲述或写作童话是由说或做来完成的，因此，讲童话、写童话也是一种掌握知识、权力，掌控自身命运的途径。

#### 参考文献：

- [1] Jack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 Walter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M]. London: Methuen, 1982.
- [3] Heide Göttner-Abendroth. Die Göttin und ihr Heros[M]. Munich: Frauenoffensive, 1982.
- [4] Dieter Richter. Schlaraffendland: Geschichte einer populären Phantasie[M]. Cologne: Diederichs, 1984.
- [5] August Nitschke. Soziale Ordnungen im Spiegel der Märchen (vols. 1 and 2)[M].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76-1977.
- [6] Raymonde, Robert. Le conte des fées littéraire en France de la fin du XVIe à du XVIIe siècle[M]. Nancy: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82.
- [7] Alan Dundes, ed. Cinderella: A Casebook[M]. New York: Garland, 1982.
- [8] Jack Zipes.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M]. New York: Methuen, 1983.
- [9] Anne Sexton. Transformation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 [10] Iring Fetscher. Wer hat Dornröschen wachgeküßt? Das Märchen Verwirrbuch[M]. Hamburg: Classen, 1972.
- [11] Richard Gardner. Dr. Gardner's Fairy Tales for Today's Children[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4.
- [12] Tanith Lee. Princess Hynchatti and Some Other Surprises[M]. London: Macmillan, 1972.

①有关儿童和成人对灰姑娘的回应并参与对话的各种方式，参见：Mary Jeffrey Collier, “The Psychological Appeal in the Cinderella Theme,” *American Imago*, 1961(18); Beryl Sandford, “Cinderella,” *The Psychoanalytic Forum*, 1967(2); and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Narrative Versions, Narrative Theories,” *Critical Inquiry*, 1980(7).

[13]Janosch.Janosch erzählt Grimm’s Märchen[M]. Weinheim: Beltz,1972.

[14]John Gardner.Gudgekin the Thistle Girl and Other Tales[M].New York:Knopf,1976.

[15]Olga Broumas.Beginning with O[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16]Jay Williams.The Practical Princess and Other Liberating Tales [M].New York:Parents’ Magazine Press,1979.

[17]Margaret Kassajep.“Deutschhe Hausmärchen” frisch getrimmt [M].Dachau:Baedeker &. Lang,1980.

[18]Judith Viorst.If I Were in Charge of the World[M].New York: Atheneum,1982.

[19]Roald Dahl.Revolting Rhymes[M].London:Jonathan Cape, 1982.

[20]Jane Yolen.Tales of Wonder[M].New York:Schocken,1983.

[21]Ann Jungman.Cinderella and the Hot Air Balloon[M].illustr. Russell Ayto.London:Frances Lincoln,1992.

[22]Gail Carson Levine.Cinderellis and the Glass Hill[M].illustr. Mark Elliott.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0.

[23]Philip Pullman.I Was a Rat! [M].New York:Knopf,1999.

[24]Patricia Galloway.“The Prince” in Truly Grim Tales[M].New York:Bantam Doubleday Dell,1995.

[25]Emma Donoghue.“The Tale of the Shoe” in Kissing the Witch: Old Tales in New Skins[M].New York:HarperCollins,1997.

[26]Francesca Lia Block.“Glass” in The Rose and The Beast;Fairy Tales Retold[M].New York:HarperCollins,2000.

[27]Gregory Maguire.Confessions of an Ugly Stepsister[M].illustr. Bill Sanderson.New York:Regan Books,1999.

[28]Marcia Lieberman.“Some Day My Prince Will Come”:Female Acculturation Through the Fairy Tale[J].College English,1972 (34).

[29]Jane Yolen.America’s Cinderella[J].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1977(8).

[30]Colette Dowling.The Cinderella Complex[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1.

[31]Jennifer Waelti-Walters.Fairy Tales and the Female Imagination [M].Montreal:Eden Press,1982.

[32]Marina Warner.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On Fairy Tales and Their Tellers[M].London:Chatto &. Windus,1995.

[33]J.Godwin,C.G.Cawthorne,and R.T.Rada.Cinderella Syndrome: Children Who Simulate Neglect[J].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80(137).

特约编辑 桑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The Semantic Power Transformation of Folktales and Fairy Tales:  
Cinderella and Its Influence

Jack Zipes<sup>1</sup>[author] Mo Chou<sup>2</sup>[translator]

(1.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55455,USA ;

2.China Tourism Academy(Data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eijing 100005)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semantic power of the Cinderella story circle in history indicates a kind of utopian demand,especially the appeal of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to change their life trajector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al and written literature,we can see that fairy tal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society as myths and counter-myths,which exert ideological influence in social reform programs involving education and culture.After all,telling or writing fairy tales is done by saying or doing.Therefore,telling and writing fairy tales is also a way to master knowledge,power and control one’s own destiny.

**Keywords**:Cinderella;oral literature;written literature